

← (上接2版)

上古音研究最重要的材料，但我们使用的谐声字材料可能产生于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地域，那么它们内部的谐声现象与谐声规则是否是一致的？因此，必须假设在一定的时空限制下，谐声现象是内部承继的。固然任何理论都可能存在反例，但如果抛开以上三点假设，许多讨论都无法进行下去。

第四，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上古音研究所使用的基础材料。除《诗经》押韵之外，最为重要的有两类：第一是反切行为和反切规则，第二是谐声行为和和谐声规则。这两类材料代表了上古音、中古音研究中最重要内部规则，借词等其他材料只能作为旁证。在谐声系列中，我们可能发现许多看似与众不同的谐声用例，例如，“的”（端母），“豹”（帮母）如何谐声？一般认为，谐声字由假借字加声符而来，而假借必然同音，于是谐声也理应同音；那么，如何解释不同音的谐声字？由假借字加声符得到的谐声字绝大部分都同音；但还有一类谐声字，是出于避免混乱的目的，不经过假借字阶段直接造出的，这类谐声字为近音而非同音。那么，怎样的“近音”才能合乎谐声规则？我们曾对传世文献上古用字音韵进行了统计分析，得到了一张谐声类型表。谐声类型表统计了各个声符与各个上古音声母的对应关系，是上古音构拟的基础。

第五点，我想特别强调音变现象和规则的普适性。研究音韵学就是研究音变；而音变所基于的发音器官的发音规则与听觉器官的感知规则，在古今中外都具有普适性。这也决定了音韵学研究的科学性，以及对音韵学构拟应用“假设-演绎”方法的可行性，前人如Labov、王士元、Ohala等都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。目前的做法是，建立大规模的方言、民族语语音数据库，通过研究

地理上的共时语音分布，求出历时音变规则。以上古之部拟音为例，白一平拟作 α ，潘悟云、郑张尚芳拟作 ω 。我们拟作 ω 而不拟作 α 的主要理由，就是音变规则。如果拟作 α ，之部一等字到中古时期变为 αi （中古哈韵），韵尾 i 从何而来？我的看法是，中古的元音音变大部分是推链；元音推到最高位后，就会与原有高元音合并，为了避免合并，原有高元音的音值会变化而发生“出链”，其中“裂变”是重要的出链方式之一（见下图①）。

例如， u （上古幽部）裂变增音变为 αu 再变为 au （中古豪韵），这跟英语“house”中的元音 au 来自古英语元音 u 的音变模式是一致的；又如， i （上古脂部）发生裂变变为 ei （中古齐韵），再变为 ai （粤语齐韵字音）；将上古之部拟作后高元音 ω ，首先发生裂变成为 $\alpha\omega$ ，而汉语中的 ω 元音不稳定容易变成 i ，从而 $\alpha\omega$ 再变为 αi （中古哈韵）。我想，音变的普遍规则以及音变的微观过程，将会是今后音韵学研究的重点。

郑张-潘体系与白-沙体系达成的几项基本共识

潘悟云：在此，我想强调上古拟音的郑张-潘体系与白-沙体系两家达成的几项基本共识，这些共识的达成能够避免许多学术讨论的混乱。

第一是上古“六元音系统”。格林伯格(Joseph H. Greenberg)在《Language Universals》一书中指出，世界上最普遍的是五元音系统(a, i, u, e, o)，六元音系统则是第二普遍的。“六元音系统”最早由郑张尚芳提出，是后来上古音研究的一项重要假设；此后支持六元音系统的学者有包拟古、白一平、斯塔罗斯金等。而



郑张尚芳(左图)与潘悟云二人在六元音系统、对谐声系统的解释以及《喉音考》等方面,都深有研究。

六元音系统的提出也是基于许多前人研究成果的，如现在一般将上古元部字三分为元 1 、元 2 、元 3 ，但清人并没有注意到元部字的内部差别，最早是董同龢发现一部分元部字包含 e （元 2 ），雅洪托夫发现一部分元部字包含 o （元 3 ），这些都为六元音系统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
第二是来母 $*r-$ 与以母 $*l-$ 的拟音。目前学界基本认可高本汉的中古来母拟音 $l-$ ，于是许多学者认为其上古来源也是 $l-$ ，实际上并不正确。蒲立本、许思莱、包拟古等学者都提出，上古来母为 $r-$ ，以母为 $l-$ ；李方桂体系原本为来母 $l-$ 、以母 $r-$ ，后来龚煌城修正为来母 $r-$ 、以母 $l-$ 。

第三是上声与去声的韵尾来源，上声 $<*-\eta$ ，去声 $<h<*-s$ ，最早由法国汉学家奥德里古尔基于汉语与越南语、南亚语的比较提出。王敬骝在《傣语声调考》中提出，由傣语声调以至整个侗台语声调，都遵循这样的音变模式。Graham Thurgood对海南回辉语的历史比较研究也支持了此观点，他研究的回辉语刚好是一种来自无声调南岛语的有声调语言。虽然目前还没有对苗瑶语声调的历史比较研究，但相信将来的有关研究同样会支持此种音变模式。

第四是三等介音 $-i-$ 后起。蒲立本最早提出对带 $-i-$ 介音的三等字在《广韵》里占相当

大部分的怀疑，中国学者最早由俞敏先生提出，他们都基于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对比，认为汉语中占大部分的三等字中的 $-i-$ 介音原本是没有的。郑张尚芳、罗杰瑞着眼于汉语的音节结构，特别是罗杰瑞从标记理论来分析，既然三等字占汉字的大半部分，那么三等字应该是无标记的，从而支持了三等介音为后起的观点。

第五是二等和重钮三等的来源 $*Cr-$ ，最早由雅洪托夫提出，后来支持此观点的学者有蒲立本、李芳桂、郑张尚芳等。

第六是上古汉语有形态留存。白-沙体系中构拟的形态过多，上古汉语中的形态应该只是残存形式，其形态功能已经开始让位于语序。

对上古音构拟的一些新思考

潘悟云：另外，我还想与各位讨论对上古音构拟的一些新思考。首先是上古汉语的音节构造，潘悟云体系与白-沙体系基本相同，但前者比后者稍简单。韵母部分中，韵尾所包含的有关研究同样会支持此种音变模式。

成复辅音(见下图②)。

次要音节虽少于汉语方言，但多见于西南地区民族语。次要音节表现为其韵律长度往往是其所依附的主要音节的一半，根据现代音系学的表述，次要音节为1个mora，主要音节为2个mora。例如，壮语中表示猴子的malau，ma的长度很短，为次要音节；此种音节结构常见于柬埔寨语等南亚语。

下面，我给出几条复杂辅音的音变路径：(1) $C \cdot r \rightarrow Cr \rightarrow C' \rightarrow C-$ ；(2) $C \cdot r \rightarrow r-$ ；(3) $C \cdot l \rightarrow l-$ ；(4) $C' \rightarrow C' \rightarrow C-$ 。复杂辅音包含两个调音成分，这两个调音成分同时成阻，但除阻有先后，塞擦音、圆唇化的简单辅音等都属于复杂辅音；复辅音则不同，其不同发音单位的成阻、除阻过程依次独立进行。构拟复杂辅音能够解释次要调音成分流失、主要调音成分保留的音变路径。例如：“不”在上古是帮母之部字，在“不律”($*p \cdot rud$)中则是作为长度很短的次要音节存在，后来 $*p \cdot rud$ 经由音变路径(1)变为 pud (即中古帮母重组三等字)，再到现代汉语的 $p-$ ；“蓝”字必须拟作 $*g \cdot ram$ 其中 g 是在到现代汉语“蓝”的音变过程中脱落的次要音节，而泰语借词 $gra:m$ (蓝靛)说明了上古拟音形式中 g 存在的必要性；上古汉语孤 $*k^w a$ 、球 $*g^w u$ 中的调音成分 l 都在武鸣壮语中得到保留(武鸣：孤 $k^w a$ 、球 $k^w u < g^w u$)。如此从复辅音到复杂辅音再到单辅音的音变链，在南岛语、南亚语、侗台语等东亚语言中都具有普遍性。

我在此提出一个自己构拟的前置辅音加流音的音变公式：(1) $pl \rightarrow t-$ ， $p^h \rightarrow t^h-$ ， $bl \rightarrow d-$ ， $ml \rightarrow n-$ ；(2) $pr \rightarrow t-$ ， $p^h \rightarrow t^h-$ ， $br \rightarrow d-$ ， $mr \rightarrow \eta-$ 。通过对一些藏语、汉越语个例的考察说明，潘悟云体系涉及这类音变的构拟与白-沙体系相比更具解释力。更有意思的

